

日本文人小野西洲的儒學修養 與經世思想： 在殖民地臺灣的開展

林以衡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在東亞研究蔚為浪潮的今日，位於中國與日本兩大國家間的臺灣，其文學、歷史、政治與經濟值得研究者重視外，寓於其中的思想脈絡，更值得深入探究。因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正面臨政權交替、新舊觀念替換的關鍵時期，大量日本官員來到臺灣的同時，除了將日本殖民統治的理想帶來外，文學觀和思想觀也大量地被引介進入臺灣社會，構成日治臺灣中、日文化混雜而生的特殊性。有鑑於此，本文以日治時期來臺文人小野西洲的個案研究為例，藉由史料的耙梳探究其儒學修養與經世思想外，亦論述小野西洲如何以上述兩者建構自身對殖民地臺灣的想像與期待。

關鍵詞：東亞 儒學 小野西洲 經世 殖民

日本文人小野西洲的儒學修養 與經世思想： 在殖民地臺灣的開展

林以衡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一八九五年（1895）日本領臺後，臺灣在政治、社會乃至於經濟上都起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不但是時代巨輪不停演進下必須經歷的過程，更是統治者身份轉換後所發生的現實趨勢。但不可諱言的是，雖然在統治階層方面的國籍、人種由中國變成日本，透過不少前行研究，我們卻發現不同的統治者，在文化層面卻有相近之處。^①這個以「漢文」、「漢詩」或是「支那文學」所建構起來的文化共識，不但增進臺灣文化研究的多樣與繁盛，在現今或未來的學術導向上，更是將臺灣研究接軌東亞研究時不可缺的思考路徑。

值此動蕩年代，當人心不安或想為新的時代尋找定位時，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是否能安定人心，或是如何與現實相配合以交互運用、發揮其經世功用，以達

① 近來關於此一臺、日文人相交流的論述文章日益增多，諸如陳培豐、黃美娥、廖振富等學者，以及研究者陳惠茵等人針對此領域進行論述。其中，黃美娥已對小野西洲的國體思想有初步的探討，但對其整體文風和思想仍待研究者進一步深論。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1-32。

求新、求變的目的即值得探究。^②而此現象若發生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統治關係中，更會衍生出不少耐人尋味的思考。所以，當日本文人陸續來臺任官、旅遊並與臺灣文人產生互動後，這些殖民文人們的思維模式與意圖，即有必要一一加以梳理，才能建構出完整臺、日文人如何以文學、思想進行互動的網絡。

在眾多日本來臺官員中，小野西洲（小野眞盛）可以說是一位已被當今學界肯定其學術影響力，但卻還待後續研究者更進一步了解其全面思想的知識份子。^③小野西洲是一位在臺灣語研究上不遺餘力的來臺日本官員，自 16 歲來到臺灣後，歷任臺灣總督府檢查局、臺南檢察局、臺灣高等法院通譯等職務。雖然他在渡臺前僅於日本受過短期的漢文私塾教育，似乎學問略有不足；但在渡臺後，小野西洲除了持續勤勉向學以求出人頭地外，基於通譯職務的需要，他開始致力於臺灣話研究，並身體力行地進入臺灣傳統書房學習漢文和臺灣話。小野西洲積極向學

② 「經世」一詞，與儒家有密切關係，王爾敏由《漢書》整理「經世」一詞源自儒家司徒之官，並指出：「閱讀《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其中儒家先賢所諄諄以教人者，多在於為人為政、持禮樂以訓民治事。實皆司徒官之常行。」又說：「『經世』辭旨，本不深奧，由『經國濟世』一詞簡化而來。」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13 期（1984 年 6 月），頁 30-31。由下文對小野西洲儒學修養的探究亦知，小野西洲對《論語》、《孟子》、《孝經》等中國經典古籍的閱讀，除表現他的儒學修養外，透過本文分析，亦可證儒學思想影響其經世理念。

③ 最早對小野西洲進行研究的是李尚霖：《漢字、台灣語、そして台灣話文：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台灣語文運動に対する再考察》（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 6 月）。以下對小野西洲的生平略述，即是參考李尚霖的研究而得。陳培豐延續李尚霖的相關論點，肯定小野西洲：「要討論日本人的臺灣語教育，尤其是統治末期的警察官臺灣語教育養成及媒體檢閱，則非談小野西洲不可。」可見小野西洲研究的重要性。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 7 月），頁 243。楊承淑的研究，則著重探討小野西洲的翻譯成就、知識生產等問題，並對小野西洲在臺灣的事蹟有系統性整理，但未論及小野西洲思想方面的問題。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翻譯論叢》第 7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37-80。黃美娥則略論小野西洲在時論文章中，企圖以「支族」關係來合理化日／臺的相異血脈；以「同化」手段來提升臺人的「國民」素質，此則小野西洲政治觀的闡發。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收於梅家玲編，《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298-299。

的態度，影響到他在所著文章中，不停地倡導「勤勉向學」、「用功讀書」以求「修身」的教化觀點，可見他力求理論與實務並進的人生態度。^④與其他一來到臺灣、立即能以自身漢文底子與臺灣傳統文人進行詩文唱和的日本儒官相較，^⑤小野西洲的求學之路或許比他們要走得更为艱辛，但，大器晚成的漫漫之路，卻也養成他時常以自身經歷自勉，或透過相關文章與他人共勉、彼此激勵且重視實務的行文風格，成為他在臺灣語文研究外，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研究面向。

也許是因為少時失學的遺憾，小野西洲目前可蒐羅而來的文章中，除了臺灣語文研究的文章為數最眾外，以勸學訓世、道德教化、救亡圖存為主題的經世文章也值得注意，這些文章的發表，主要集中在1911-1932年，此時期臺灣正經歷日本大正民主時期、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民族自覺思潮的洗禮，臺人對於臺灣未來的走向多有討論。但亦在此時期，日本對臺統治進入「內地延長時期」，希冀透過部份的政治改革，加強臺灣知識份子對政府的認同感。在這些歷史背景影響下，小野西洲帶有強烈經世觀的文章，^⑥既展現當時世界局勢的轉變，也呼應總督府對臺灣的殖民政策，故探討小野西洲的經世文章，可逐步發現小野氏的經世思想，是對殖民地臺灣宣揚日本國族主義、講求文明進步，並由禮義規範出發，期盼被殖民地民眾成為循規蹈矩的日本新國民，表現出日本殖民者對統治殖民地臺灣的野心，希望將臺灣建設成符合殖民政府要求的海外天地。^⑦但，若欲探討小野西

④ 小野西洲刻苦自學、不因困苦和疾病而退縮的學習過程，可參考楊承淑對小野西洲生平，有詳細介紹與論述。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頁45-51。

⑤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年6月），頁110-111。

⑥ 本文將探究小野西洲的文章歸類於經世類型，可參考劉廣京分析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後，對「經世」的廣義定義：「舉凡為學為政之原則，以及學者之志向、為學方法、個人道德修養、以及對人性、天道、歷史之了解等，凡與政事及致用之原則有關者，皆屬廣義之『經世之學』。」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164。

⑦ 劉廣京認為：「『經世』一詞大家常常聽到，在十九世紀中國歷史上應如何解釋？『經世』有時可以說是做官，但中國傳統的經世一詞，涵意的要點不是做官，而是做事。要真正負責有裨於國家人民的事。『經世』的概念含有理想主義的成分，要求知識份子對實際事務有貢獻。」，同前註，頁2。

洲經世思想的形成，則需先探究其背後所依循的理論。本文除思考小野西洲在殖民地臺灣闡述其經世思想外，亦先思考小野西洲的儒學修養如對其經世思想產生影響？畢竟，經世觀的形與，與儒學思想密不可分，⁸這是本文透過小野西洲思想的個案研究，所欲解答的問題。

二、「文質彬彬」的追求：小野西洲的儒學修養

日治初期，日本來臺的文人或官員大多具有深厚的儒學修養，因此楊永彬以「日本來臺儒官」之名稱呼這些文人和官員外，⁹他們行事學養也值得吾人深入探究。小野西洲和大多數的日本來臺官員一樣，除了受到明治維新求新求變、文明進步等觀點影響外，目前雖無法得知他在日本求學的詳細過程，但透過前人研究對其生平的簡述，以及研究者對日本德川時期教育制度的考察，¹⁰可以推測小野西洲學養的形成，除勤勉自學外，主要是來源於日本私塾或是臺灣書房的教授，而這些教育皆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教育。儒學對小野西洲的影響，表現在他的文章中，也會成為他日後判斷事理的依據。例如，他在〈醉後漫錄〉中，以四言詩的方式品評顏回、閔子、程伯子、曾點、曾子、原憲、孟子、司馬溫公、子路、子貢、子夏和子思共十二人，這十二個人中，不但包含孔門四科十哲的部份人物，也有時代較晚的如子思、孟子、司馬光和程顥等人。小野西洲此舉，既是歌頌孔門賢人，也是以先賢做為自己立身處事的楷模，例如稱顏回：

德行之科，獨冠學徒。聖言默識，不違如愚。不遷不貳，心與道俱。簞食

⁸ 王爾敏說：「經世之實義，雖在近世，必出於儒家者，均由中國廣義之儒而形成。……經世乃儒生入世為政宗旨，志在治天下於太平，登萬民於席衽。」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頁 27-38。

⁹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頁 110-111。

¹⁰ 中國典籍和儒教思想對日本影響的深刻，可參考辻木雅史著、田世民、張崑將譯：《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思想與媒體》，（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 6 月）。

瓢飲，陋巷愉愉。雖云屢空，其殆庶乎？¹¹

又稱曾子：

侍師受教，調垂《孝經》。至德至要，允為典型。一貫道德，獨得把握。
脩齊治平，著作《大學》。¹²

既然提到曾子與《孝經》的關係，進一步以閔子為例，頌揚他的孝行：

愉色婉容，□□成性。孝哉之稱，無慚德行。人無間言，學優希聖。公□
增封，永錫嘉慶。¹³

上述對顏回、曾子和閔子騫三人的讚美之詞，可見小野西洲對於儒學人物的景仰，也能了解他們各自特點而予以稱頌。其中，小野西洲強調顏回為德行之最、曾子和閔子以「孝」聞名，除表現出他對品德的要求外，也不脫儒家思想中對「孝」的重視。¹⁴其他如子思、孟子、程顥和司馬光等人的品評，則顯露出小野西洲對於儒家系統一脈相承的基本認識。小野西洲撰寫此文時正值一年伊始，他自稱：「噫噫旭日逢元旦，余獨坐南窓下，暢飲梅花酒，醕酏於此。」¹⁵連在休暇之餘都不忘追述聖賢事蹟，先聖先哲的德行正逐步內化為小野西洲人生欲遵循的道理和楷模，此精神亦在雜文〈病中漫言〉中表露無遺。¹⁶

小野西洲所展現出的儒學修養，並非只限於對人物的敬仰和品評；梳理他的文學觀，可見小野西洲引《論語》之言闡述他的文學理念。在中國文學理論的範

¹¹ 小野西洲：〈醉後漫錄〉，《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月19日。

¹² 同前註。

¹³ 同前註。

¹⁴ 小野西洲：〈孝道〉，《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4年1月20日。

¹⁵ 小野西洲：〈醉後漫錄〉，《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

¹⁶ 小野西洲：〈病中漫言〉，《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5年10月31-11月20日。

疇中，《論語》建構起後世對於雅文學的基本認知，它讓「文」與「詩」分別代表「學術」與「純文學」的分別、或是「無韻」和「有韻」的概念，這些文學早期觀點的建構，影響日後文人的文學觀，同時也提升文學在教化方面的作用。¹⁷在這股傳統概念下，小野西洲的文學觀也展現出其儒學修養。〈詩想〉一文，開宗明義地引《論語》之言作為作詩時應恪守的原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者實也，文者華也。華實兼茂，而後人事克完。¹⁸

內容和形式的並重，始終是文學創作的最高理想，小野西洲認同儒家的文學觀，強調文學有如為人處事，必須力求華實兼重，才能是「人事克完」的好文，但，真的能輕易地達到這個理想目標嗎？小野西洲深知理想總難完全實踐，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人的心性天生偏好美的傾向，所以：

然於美則好之，於醜則惡之，天情之常，比比而然。溫柔敦厚，美德也。放僻邪侈，醜行也。人性本好善而惡惡，見美德而好之，見醜行而惡之。出於自然之性，固不足怪。¹⁹

上述文字，除是認清人之天性愛美向善，而明瞭「文質彬彬」有一定的難度外，談人性好善而惡惡，再次彰顯小野西洲的儒學修養，是沿襲孔子以降，子思、孟子的性善系統。重要的是，文中提及「溫柔敦厚」、「自然之性」等觀念，即是小野西洲欲論述詩教的重點所在，此即：「身心涵養」和「顯揚涵養」所不可缺少元素。但，不是所有的詩都能達到小野西洲的要求，他認為：「古之詩陶鑄性情，今之詩舞文弄墨」，²⁰但現世之人仍應努力反求古詩要旨，才能達成「陶鑄性

¹⁷ 徐志平、黃錦珠：《文學概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9月），頁27-28。

¹⁸ 小野西洲：〈詩想（一）〉，《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6年2月17日。

¹⁹ 同前註。

²⁰ 同前註。

情」的真實目的。所以他稱讚子貢：「善悟引詩」、原憲：「行歌商頌」，又引《毛詩序》予以證之，再再都是爲了強調詩之優點。²¹那麼，當代之人若欲學詩，則必須遵守哪幾項要求呢？小野西洲首先以幾個大原則說明須把握的要旨：

今之欲學詩者，必其講學明道，恪遵乎興觀群怨、邇事父遠事君之聖訓，斯可謂之學詩。學詩則性情陶鑄，始焉發揚其慈愛和雅之忱，終焉涵養其溫柔敦厚之德。²²

可見儒家詩論的觀念深根於小野西洲的文學觀中。那麼，小野西洲自己有沒有達到此一標準呢？畢竟，小野西洲在前文中批評當今之詩近於「舞文弄墨」，也引起他人對小野西洲詩作的質疑，小野西洲說：

或有謂余者曰：「如子之說，詩之一道，似乎略解其意。若論子之所作，猶是辭華美麗耳、猶是一種遊戲耳。喜則知笑，怒則知罵。志動則知發語言，笑罵言三者，以筆記之、以口述之，可以示他人，可以傳後世，辭華麗美何為哉？」嗚呼！為是說者，知其一不知其二，知有質不知有文者也。直等於勃□而論已耳，人有意中喜怒之事，卒然向人笑罵，聞者豈易曉其意？不唯莫曉其意，且適以為狂為愚。狂矣愚矣，將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噫，如或人之言，是取舉事直書，若寫真之徒存其質，不識窮形盡相，必繪畫乃能臻其美也。夫人心之靈巧，能奪天工。神機□矣，造化之妙。間或遺失，乃不文不雅，甘自棄天姿之巧妙、自廢文字之性能？²³

小野西洲以自身作詩經歷出發，與全文一開始的「文」、「質」討論互相呼應。他認為「質」雖然重要，但文學中還是必須要有「文」的組成，才能夠讓讀者通

²¹ 同前註。

²² 同前註。

²³ 小野西洲：〈詩想（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6年2月18日。

曉暢達，不然，只講內容但不求文彩的雕飾，文學將失去感動人心的特點，而流於平鋪直敘，教化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且若事事都以直書而論，反而會不文不雅、自廢文字本身所應有的功能，如此也就失去文學的本質了。

到底要如何才能朝「文質彬彬」的理想邁進呢？小野西洲仍不脫貴古賤今的觀點，他批評今之詩多遊戲之作，因為今之詩缺乏「真性情」，所以為「浮華虛文」：

詩之美，非等浮華虛文。浮華虛文，今之詩也，非古之詩也。古之人有言所不能發，儘可發為詞章、托諸文字、以達其意。必如是纔能使人聽其言、接其語。更惹出倍蓰之感，是揚於之功力也、是詩之妙用也。²⁴

詩的最主要功用在於以詩教化，²⁵所以為了讓詩以教化為目的的「情」、「志」能順利表達出來或傳於讀者了解，就要避免「人有意中喜怒之事，卒然向人笑罵，聞者豈易曉其意」的缺點，而是在真感情之下以修飾過的文字加以抒發，才能與讀者互相產生共鳴，引用古詩之語就是：「古詩曰：『英雄胸中有日月，又曰英雄多情』，參透此語，可謂真英雄者，乃能善解真詩想焉。」²⁶「日月」借代內容，而又必須要有真情的配合，才能達到文學「文質並重」的目的。

詩論之外，小野西洲所作之文或其文論，亦有可探討之處。他的文章題材包羅萬象，有引用他人之文為己立論、²⁷有立志勸勉、²⁸提倡道德、²⁹政治議論³⁰等

²⁴ 同前註。

²⁵ 他談及孔子刪訂詩篇之舉，所以《詩經》是為了：「為六經之一，其為教也。」同前註。

²⁶ 同前註。

²⁷ 樗牛君作、小野西洲轉引：〈文學及人生〉，《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4年4月22-23日，或是大國錦成作、小野西洲轉引：〈梧窓漫筆〉，《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6年2月23日-1927年3月27日。大國錦成，生平不詳。由於原件不清楚，經多次辨認後漢字應為「錦成」無誤。可是查閱幕末人物的生平，與小野西洲所指時代相符者，只有大國隆正（1792-1871）一人，其為幕末明治前期著名國學者，但生平字號卻無「錦成」。可參考白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頁180。或朝日新聞社編，《日本歷史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年6月），頁291。

文章，雖以「經世」題材為多，但由此仍見小野西洲創作力的旺盛，同時詩文並進，在語言研究外仍展現出他的文學長才。在文論方面，小野西洲推崇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暇日讀《文選》，其華艷靚麗、儼如美姝。及覽秦漢間鍋封典冊、奏疏諸文，然後知文有上乘。彼六朝綺靡之餘，何足觀哉？文章彪炳，莫如六經。……近世乃推韓柳歐蘇為四大家，更近而求之，則左氏莊周司馬遷班固四子，俱有著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之名。²⁸

小野西洲對於六朝文學的「綺靡」感到不滿，因而推崇先秦兩漢這之有物的散文，以及與它相傳承的唐宋古文。他以比喻的手法表達出他對於這些文體的喜愛：

《左傳》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盡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馳騁不可羈、自然中律。孟堅之文，整頓比諸武事，遊奇布列、尺寸不爽。且布勒雍容、大可觀賞，有儒將之風度焉。諸家機軸變化雖如不同，然皆為文章絕技焉。²⁹

就整體文學觀而言，小野西洲重視的是有實質內容、且能紹述儒家之道的文學作品。在此概念下，他仍然注意到文學作品間的獨特性，有如曹丕《典論·論文》中雖對「建安七子」有整體正面的評價，但仍然依照各人不同的文學特點加以評斷，這是身為一位文學批評家必須具備對文學「見樹又見林」的洞察能力。小野西洲本身就是在進行後設批評，他把這些文體當成研究的對象，極力頌揚他們的

²⁸ 小野西洲：〈勤勉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8年11月12日。小野西洲：〈論成敗〉，《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8月22日。

²⁹ 小野西洲：〈論善惡〉、〈論善惡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5月28-29日。

³⁰ 例如小野西洲：〈臺灣治績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7年4月5-7日。

³¹ 小野西洲：〈論文（一）〉，《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9年4月6日。

³² 同前註。

優點，這當中小野的喜好自然佔了絕定性的作用，但他能一一指出這些古文的特色，並用文學手法將其形容於讀者眼前，無形中吸引當時閱讀者的興趣，也在一片現代化的浪潮中，試圖尋找文學復古的可能，形成文學觀與當代潮流匯流的有趣現象。

小野西洲給予唐宋八大家的評價極高，但在分別介紹八子的特點外，他也指出自己對唐宋八大家不滿之處：

雖然諸家各有病處，亦無容諱。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病較少耳。究竟昌黎失在生硬、老泉失在粗豪，二子之病，猶愈于他家，故欲學八大家之文者，宜各就其人之文知其妙處。」³³

小野西洲對於唐宋八大家褒多於貶，這是身為一位評論者所必須具備的洞察能力，他的觀點並不一定是金科玉律，但卻表現出一位日本漢學者對於中國文學的再省思。當然，他最厭惡的還是只學到皮毛的模仿之作，所以他批評明代的復古運動：

若夫自明以降之文，無有可觀者。何則？明興李王相繼而起，僅以模擬古文為目的，修飾末技，自以為壓倒唐宋為得意，是其文亦太荒蕪矣。殊不知六經者奧也、左莊四子者室也、唐宋諸家者堂也。欲入其室，不可不經歷其堂。不經歷堂室，安得窺其奧乎？明人之文，不經歷乎堂而入室，遽欲窺奧者不獨不能知其堂，終難免為門外漢而已。是以後世學者，徒務泛濫百家，于其字句結構，用虛稽實、紆徐縱閉。變幻狀態，苟能一一了悟？³⁴

小野西洲由對唐宋八大家的優缺感想延伸到對明前後七子李夢陽、李攀龍和王世

³³ 小野西洲：〈論文（二）〉，《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9年4月7日。

³⁴ 同前註。

貞等人只知摹擬的不滿，除表現出他對「重模擬而少獨創」的為文之風予以批判外，以「登堂入室」之語指陳明前七子為文的膚淺，也是將其所認定的習文步驟寄寓於貶責之內，以供後世參考。

綜觀上述，小野西洲對於什麼是「好文學」的標準，是立基於文學要講究言之有物、避免模仿因襲，且又要以真性情配合。最重要的是，無論是言詩或論文，他在闡述其文學觀時，不時地將其儒學修養寄寓其中。這樣的文學觀固然表現出小野西洲嚴謹、務實的態度，但也造就小野西洲之文，少遊戲之作，而大多是提倡道德、勤學問、求勤勉等以「教化」為主的經世特點。就算是生病時所作諸詩文，也都在談人生道理，成為自身的行文特色。³⁵

小野西洲的文學觀念充滿著對儒家「紹述正統」的志向，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小野西洲的主要思想來自於儒家，他對於中國其他先秦諸子的學說並不排斥，並非完全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只是在文學、處世方面體現他的儒學修養。例如他在〈論文〉中指出莊子哲理散文的優美，即是以文學的角度加以評價，並未因為莊子的思想與儒家不符而忽視。至於他在〈論墨子〉一文中，對於儒、墨的相斥或用途，則顯得較其他同時代的人文更為客觀公正。³⁶他不滿意孟子全盤地否定墨家，因為：「至今翻墨子熟讀，則知尚有可學之處。」³⁷但墨子之說，理想過於高遠，在實踐上有困難：「以為社會謀福利。是一種理性教。以節欲增公益為目的。其理想高遠矣。」小野西洲認為墨子之說為社會謀福利值得肯定，但要做到「節欲增公益」卻難以達成。就此點而言，小野西洲對於人性的天生慾望有較實際的理解，畢竟他強調為文要「真性情」，那麼就不應該以「節欲」來做為

³⁵ 小野西洲的文學觀是與其經世抱負相互呼應的。若以魏源對經世之學的標準為例，載道之文即是經世之學的體現。劉廣京說：「魏源等人的經世之學，有三個原則。其一就是經世之學或經世思想必須以能致用為目的，以文載道，論治亂之原，明風俗之隆替，有裨世道人心者為經世之文，且可視為經世之學。但純文藝不能視為經世之學。」此觀點可做為小野西洲文論的參照。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頁162。

³⁶ 小野西洲：〈論墨子〉，《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30年8月27日-9月2日。此文的刊登背景，是當時的臺灣文壇正興起一股儒墨論戰之風，詳細可參考翁聖峰：〈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21。

³⁷ 同前註。

衡量事理的準則。翁聖峰認為小野西洲的這篇文章可視為儒墨論戰的總結，指出儒墨各有不同之處的論點，清楚指出此文的時代意義，³⁸但可以再深入思考的是，當小野西洲總結儒、墨異同並指出墨家的功用所在時，仍不脫「儒主墨輔」的觀點：

故欲以此教義。為永遠不變之法則。而救人心世道則為不可。然在人人困衣食，萬民哀苦之時，若以此教義，補救一時，何為不可？³⁹

對於儒、墨論戰的結論，不但是調合，更指出儒、墨兩者的功用性不同，也就是儒學用於大處而墨者宜用於小處。⁴⁰若要觸及改正風俗的問題，還是必須以儒學的力量為主，才能達到連根治理的效果，而墨家終究只能是短期、治標的藥方，無法達到長期的影響力。

三、經世思想的闡述：文學創作應符合時代潮流

由對小野西洲儒學修養的觀察，可了解他力主文學應達成教化社會的使命，也證明小野西洲是位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知識份子，那麼他是否能將其儒學修養轉化到己身經世思想的建構？若由小野西洲的多篇文章觀察，可見他以「經世」為主的書寫方向。⁴¹綜覽小野西洲的各篇文章，他在研究臺灣語文有傑出項獻，亦

³⁸ 同前註，頁 16。

³⁹ 同前註。

⁴⁰ 當臺灣文人為了儒、墨學說發生論爭時，小野西洲以一個總結性的調和角色為此次論爭暫時畫下句點，在〈支那文學論〉中也以「支那文學者通性」為主要論點，表現小野西洲雖以儒家為主，但對中國各思想派流並不排斥。小野西洲：〈支那文學論〉，《臺灣日日新報》，第 6 版，1912 年 11 月 9 日。

⁴¹ 余英時指出：「儒家自始即是一種有體有用之學，……，儒學之用決不專在少數知識份子成德或成學一方面，其最終目的是要「措之天下」、「潤澤斯民」，這便是所謂「經世」或「經世致用。」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頁 419。

不遺餘力地撰寫各式文章以實踐自己文學理想。以形式而言，舉凡詩歌、札記、政論、文論和漫言都是他運用過的文學形式；在內容方面，論述國際局勢、針砭時政和勸世向善都是他強調的議題。例如〈時事評論〉、〈世界大戰如何結局〉、〈戰亂大觀〉是屬於政論性質的文章，主要在描述、評斷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和戰後各國勢力的消長和未來走向，內容多提及奧匈帝國、塞爾維爾、美國等國，其中，與日本利害相關的俄國和德國更是此一系列文章的重心。⁴²〈內地遍路記〉、〈別府溫泉〉等文章，則是以寫實的手法紀述日本國內的踏查和旅遊實錄，並根據作者所見做出針砭時政的議論。⁴³由於小野西洲在臺灣的生活佔了他生命中的多數時光，文章如〈島民幸福〉、〈臺灣治績頌〉等，則為擁護殖民政府的頌揚性文章。其他像是〈勤勉論〉、〈論成敗〉、〈論善惡〉、〈勸告為父兄者〉等文章，更是立基於儒學修養且強調應加強臺人道德的教化文章，內容中也暗含以日本國民性作為殖民地臺灣民眾效法對象的政治企圖。大致上來說，抒情賞玩性質的文學作品大多出現在詩歌中，較少在其所撰述的文章中出現。這種積極入世傾向明顯的文章，構成小野西洲的主要行文特色崇古但不守舊，表現其經世理念：

夫一花之下，能使一時代之情形，發現紙上。讀者如身臨其境，或縱談國事、或細論家常、或就道德上闡明仁義之端，或就倫紀上表揚忠孝堅貞之節，佩實銜華、頭頭是道。經世文章，大都如此。⁴⁴

歸納上述引文，「言之有物」、「經世致用」、「文章合為時而作」等特點交織成小野西洲主要的文章風格，代表小野西洲以較為嚴肅的態度去進行文章的寫作，

⁴² 小野西洲：〈時事評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5月30日-6月4日。小野西洲：〈世界大戰如何結局〉，《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7年11月23日-12月3日。小野西洲：〈戰亂大觀〉，《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8年3月22日-4月3日。

⁴³ 小野西洲：〈內地遍路記〉，《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32年10月2日-5日。小野西洲：〈別府溫泉〉，《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27年8月25日-8月27日。

⁴⁴ 小野西洲：〈論文章功用〉，《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2年2月4日。

以及要求文章的實際功用。這就造成小野西洲在爲文的態度上，力主作家應該觀察時勢脈動、體驗時局的變化，才不會陷入畫地自限的缺點，所以爲文要言之有物、鏗鏘有力，就必須先了解作文時會出現的弊病：

文學之有弊也，猶氣之為風為雷乎！儒者學古入官，其大要莫重於研智脩德、以求寔益。顧求益之中，後患寓之，今將舉其弊，為之先言其利焉。⁴⁵

小野西洲在首段先以自然現象如風、雷、雲為例，論述凡事皆有利弊兩面向的不變法則，之後，再以自然之例引申探討以往作文時常被視為金科玉律的構思方法，內部其實暗含不符合現實潮流的弊端，他認為古時爲文過重強調「在內不在外」、「在靜不在動」和「在知疑不在輕信」，故以此三者為依據，分別提出他的看法：

其在內不在外也，閉戶潛脩，戶庭不出。書外事務，耳未嘗聞。斯世變端，目未嘗睹。耽空理，不徵事實。胸蓄未券，泛應□然。一旦出而問世，庶事叢脞，其遺害之出於無心也。有如雷之烈，幾欲破山雷之迅，不及掩耳。此學之但之處內者，其流弊一也。⁴⁶

小野西洲擔憂為學者若足不出戶，只求閉門讀書的學問而不知外界的變化，將會失去對事實的認知。當某天推門出去後，將會跟不上時代潮流，造成更大的挫敗，同時對於外在知識的缺乏，對於學問的養成只會有弊而無害。至於「在靜不在動」，他認為：

其在靜不在動也，深思遠慮為當，靜坐幽居為世。身體陷於虛弱神氣趨於不敏者有之，性靈遲滯流於因循息者有之。一旦拋書，置身紛擾之地，不克靈機應變，卒至遇事輕浮，其鹵莽滅也，有類於風之暴，摧折難堪風之

⁴⁵ 小野西洲：〈文弱流弊論〉，《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2年2月27日。

⁴⁶ 同前註。

疾，怒號不已。此學之但知守靜者其流弊二也。⁴⁷

在過去的觀念中，皆重思考而輕行動，小野西洲認為，過度的思考，只會讓人身體和思路流於遲滯，同時處事缺乏經驗，將會造成人生挫敗。所以動靜之間要如何取捨，是做為一位讀書人行文時所必須注意到的問題。這裡的動靜之分，所指的並不是文人下筆與否的問題，而是指文章之作除了文人在靜態的思考外，還要兼顧對於實際情況有真實反映的動態立論，才能動靜兼備，文章才不會流於空洞無用，造成與現實的脫節。

無論古今論學，都強調懷疑的重要性，因為人心有疑惑，才会有求知求真的動力，真理才會呼之欲出，小野西洲肯定懷疑的重要性，所以他引西哲之語和孟子之言，表達他對於「疑」的重視：「其知疑不輕信也，西哲之言曰：『疑為發明之母』，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⁴⁸無論中西，都肯定「疑」的功用，這是小野西洲在博覽群書外，還能夠梳理出東西文化間的共同處。但，小野西洲也指出過份重視「疑」後所造成的反效果，將會造成躊躇不前的問題：

誠以過信必至貽悞，質疑乃能辯難也。然或遲疑過甚，習慣自然勢必猶豫躊躇，逡巡退縮，遇事憤激之能，又不啻雷電之相薄，與夫天大雷動以風，大木斯拔矣。此學之，但知懷疑者，其流弊三也。⁴⁹

由上述小野西洲所歸納出的為文三流弊可發現，在小野西洲的觀念中，為文之時若因「在內不在外」、「在靜不在動」和「在知疑不在輕信」三者而造成文章與現實情況有所脫節時，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文章。好的文章在於與實際生活互相結合，甚至要有解決當下問題的用處，才能將學者為文的主要意義彰顯於世。這正是小野西洲認為文學創作應當要符合時代潮流的經世論點，也印證為何他留下來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同前註。

的文章，大多是合爲時、合爲事而作，主題趨近於議論、政論性質的文章爲多。從另一角度觀察，由於小野西洲強調文章的經世功能，認爲文章要有益於現實問題，所以這些文章，才能如山川日月，禁得起時代考驗：

皎皎明月，巍巍山嶽。森森江河，仰可賞其美，俯可挹其清。然而明月之圓，有時虧焉。山岳之高，有時頽焉。江河之深，有時涸焉。獨有光明如月，無或盈虧。高峻如山，不憂頽壞。澄清如水，無慮涸乾。其氣盛則包藏宇宙，其辭宏則貫徹古今。⁵⁰

爲文如同山川形勢般有所損益，或如明月般時有陰晴圓缺，但重點在於只要文章本質是好的，可以達到思想純正、言之有物的目的，那麼文章本身也就不會受累於無可避免的問題或缺失。小野西洲指出沒有一篇文章是十全十美之作，但在符合「經世」的前提下，若爲文時以「氣盛」、「辭宏」做爲最高準則，那麼既符合行文正道，同時也兼顧爲文美感，就不用刻意地要以華美的辭藻去修飾文章，才能達到美文的境地。

「文以教化」是小野西洲發揮其儒學修養後，建立起對文學功用的看法。相反地，「玩物喪志」、「街談巷議」之類的作品，則會成爲小野西洲所排拆的文體，小說也就這樣首當其衝地成爲小野西洲所不喜的文類。他在〈病中漫言〉中強調讀經、讀史和讀詩文的重要性，但也力主「青年不可讀稗史」：

獨稗史吾人可不必讀，青年有志者，猶斷斷乎不可讀。小說者，稗史之別名也。吾甚怪世人不好讀經史、偏好讀小說者何哉？意謂小說文平易顯明、津津有味，故人一讀心醉，至廢寢食，猶嗜此不疲。⁵¹

跟經、史、詩文比較起來，小野西洲不得不承認小說的趣味性遠勝於上述文類，

⁵⁰ 同前註。

⁵¹ 小野西洲：〈病中漫言〉，《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5年11月20日。

所以才能吸引到眾多愛好者，甚至造成人人手不釋卷的現象，這是小野西洲不樂見，但卻又很無奈的感想。因為迫於現實反映，他在推動日本殖民官員學習臺語文的運動和編纂教材時，有時仍不免俗地要運用小說來做為推廣殖民地官員學習臺語文的教材，所以司法小說〈首物語〉、言情小說〈恋の羅福星〉等就是在此教育目的趨使下，刊登在他所創刊的雜誌《語苑》上。

〈首物語〉原是大阪地方裁判所通譯官西島函南在清語教科書中的案例〈知縣正法〉，後經蒼海氏改寫而成。⁵²小野西洲主要負責的部份是將小說以片假名標注臺語文拼音，讓日本來臺官員可以透過小說的閱讀學習臺語文。〈首物語〉的故事內容是以清領時期嘉義所發生的一股人頭奇案為主軸，描述十四歲的少年蔡番一大清早被巡吏發現手提包袱不停地滴血，上前盤查後，蔡番表示手提為一豬頭，但巡吏打開包袱後卻發現是一顆人頭。茫然不解的蔡番被帶回縣衙審訊，幸而縣官明察秋毫，尋線逮捕屠戶周惡，並於發現無頭屍體後，讓周惡承認因與被害人張大頭有財務上的糾紛，將其殺死後，適逢蔡番來買豬頭，而順手砍下張氏的人頭想要嫁禍給蔡番。⁵³這篇小說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在開頭的前言中，作者先為讀者介紹清領臺灣時的地方司法官制，緊接著批評清領臺灣時的治安沒有日本統治後來的好；這番言論當然是殖民者自抬身價之語，卻也表現出當時日本

⁵² 蒼海：〈首物語〉，《語苑》第8卷第12期（1915年），頁38-58。

⁵³ 以人頭充當豬首嫁禍他人的故事情節，早在中國通俗小說《忠烈俠義傳》中就曾經出現過，與〈首物語〉在敘事手法上略有不同。《忠烈俠義傳》以包公明察秋毫的斷案為主，先述韓瑞龍與母親於家中得到意外之財，為祭拜神明而去買豬頭，卻被屠戶以人頭栽贓。《忠烈俠義傳》因為一顆人頭的出現，包公及其部下卻發現更多殺人命案，最後一一水落石出。〈首物語〉不同的地方在於先敘買豬頭的過程中被更夫發現為人頭，之後才藉由縣官的訊問供出因家中掘到意外之財一事，且〈首物語〉對於縣官查案的訊問過程更較包公問案更為縝密。再者，兩篇小說雖同樣尋線捉到屠夫，可〈首物語〉卻僅描述到因仇殺而生命案，情節較為單純，而無《忠烈俠義傳》的多線式結構。值得深思的是，在不同的時空中竟出現兩篇如此相近的小說，那麼蒼海這篇參考日本刑事案例而作的〈首物語〉，最初與中國的俠義公案小說是否具備著承衍或模擬的關係，甚至其傳統性到現代性的演變原因為何？不約而同的以此案例作為小說的內容，是否可以由東亞文學交流的角度深思？種種問題值得日後繼續探究。（明）石玉昆：《忠烈俠義傳》（即《七俠五義》）〈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臺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人對清廷的鄙視，以及意圖宣傳日本治臺會比清廷領臺帶給人民更良好的治安。其次，在小說的情節中，作者很仔細地描述縣官在審訊過程中與蔡番的一問一答，藉此逐步勾勒蔡番由母親獨力撫養成人的身世、購買豬頭的經過，以上表現出現代法官在判案時應具備冷靜思考和抽絲剝繭的能力外，也要具備適時對疑點提出訊問的敏感度，才能做出不冤枉好人的判決。⁶⁴小說中歷歷表現出一幅具有理性特質的司法審訊，而非指陳司法的弊端，可見作者並沒有因為對清政權的輕視，而忽略對清官的歌頌，或是刻意描述司法的負面形象以醜化清廷。但這也是小野西洲等人自身是司法人員，故重視司法形象的維持，才會在選材時多方考慮，畢竟若形塑一個良好正義的司法形象，不但對執法人員有樹立楷模的作用，也會讓民眾對司法有信心、有助於殖民統治的進行。

所以，小野西洲會選擇刊登〈首物語〉這篇司法小說，主要目的是著重於它的教育功用和教化效果。對於當時在臺灣任職的司法人員而言，可以透過類似的選文，修習到刑案的實務經驗、從中學習臺語文以便和民眾溝通，還能兼具閱讀小說的娛樂性，此類小說就不會是小野西洲所厭惡的文類。但如不是此種性質的小說，小野西洲還是深惡痛絕，特別是當他見到青年學子者熱衷於小說閱讀時，他主觀地認為小說家是敗壞社會風氣的始作俑者、只是假藉正道之名行道德淪喪之實：

據小說家，讀世道衰微、人心澆詭。有子殺其父者、有僕刺其主者、有兄弟自相殺戮者。小說之作，原為勸善懲惡，以敦世風。云云，自吾思之，其然豈其然。小說者大抵以風華麗詞，說男女情話。作之者務投世人之好奇心，希望世人多購，為廣流傳，藉獲利益。⁶⁵

文學觀點，夫人自異，對照同時代學者如晚清的梁啟超，或是同樣身為來臺日人

⁶⁴ 蒼海：〈首物語〉，頁38-58。

⁶⁵ 同前註。

宮崎來城重視小說的文學觀，⁵⁶小野西洲對於小說家的批評似乎太過。但在猛烈批評小說的文學態度下，他卻有嘗試以臺語文書寫的言情小說〈恋の羅福星〉，⁵⁷將審判「苗栗事件」主事者羅福星的應訊情況，由親身體驗出發改寫為淒美的愛情小說。此篇小說的寫作動機除有緩解抗日份子不滿的用意外，⁵⁸主要目的還是為了達成臺語文教學，故在文筆拙劣的謙辭下，仍在小說前言表現出其努力追求臺語文對白流利的期盼。⁵⁹可見在小野西洲的觀念中，小說好壞與否，仍須視其有沒有實用性質，才能有益於讀者閱讀，而不會成為世風不古的始作俑者，其普及性與趣味性也應要有教化目的，以及臺語文的教學功能。小野西洲本人不以小說創作見長，目前所見到的史料所見小說作品不多，⁶⁰多數作品還是運用中國古文如來達到教授在臺日人臺語文的目的。⁶¹足見其心中仍視小說為小道，其重要性無法和詩、文等文類相提並論。但歸納這些文類的共性，皆是小野西洲推廣己身文學理念、培養官員們言之有物和學習創作時的範本。小野西洲就在「經世」的文學觀點下，融合己身儒學修養、發揚詩文教化的特性進行創作，透過這些實踐性的創作，在臺灣任官的小野西洲努力發揚其經世觀，試圖培育臺灣民眾成為日本帝國統治下具有新道德、國際觀的新國民。

⁵⁶ 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第9期（2010年6月），頁97-122。

⁵⁷ 草庵（小野西洲筆名）：〈土語小說：恋の羅福星〉，《語苑》第7卷第3期（1914年），頁36-56。

⁵⁸ 楊承淑分析小說寫作背景與當下氛圍後持此論點。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頁63-64。

⁵⁹ 草庵（小野西洲筆名），〈土語小說：恋の羅福星〉，《語苑》，頁36-56。

⁶⁰ 除了本文所例舉的兩篇外，目前可見的小說還有草庵，〈金手環〉，《語苑》，9.11（臺北：1916），頁51-62。小野西洲：〈至誠！醇化の力〉，《語苑》第28卷第7期（1935年），頁62-84。

⁶¹ 例如〈漢文講義〉專欄以歐陽修、郭子儀等文章作為學習臺語文的讀本。《語苑》第7卷第8期（1914），頁36-40。第8卷2期（1915），頁56-58。

四、儒學修養與經世思想在殖民統治中的合流與實踐

以殖民者的身份來到殖民地臺灣擔任法務工作，小野西洲的興趣多元，他的信仰和目的卻是專一。他的文學觀倡導詩文的雅正與實用，將儒學修養寄寓於其中；⁶²同時他因身為法務通譯，努力地在日本官員間推廣臺語文教學，以便於官員對臺灣民間的管理，顯露出他對語言的興趣及研究者的特質。當然，他也和其他來臺日本儒官一樣，適時地創作詩、文並與臺灣文人應和酬唱，努力地想要融入臺灣本地的知識份子群體中。但，小野西洲的多才多藝，並未因此淡化他為一位殖民者對殖民地臺灣的統治理想。跟大多數的殖民官員一樣，小野西洲亦視臺灣為充斥陋習且待教化的地域，他以法務人員的觀點出發，批評臺灣急待改進的社會風氣，所以在〈勸告為父兄者〉一文中，以青少年犯罪為例，批評臺灣社會的亂象：

況本島人有一種惡習，視拾得之物，以為自己好氣運，非竊取他人物者比。泰然自若，儼然據為己有，一若毫無違法也者。獨不思雖屬遺失物、埋藏物，一經拾得，必須報官；如隱匿不報，罪無赦，法令煌煌，宜知遵守。乃為之父兄者，靡特不說此警戒其子弟。⁶³

小野西洲批評臺灣民眾沒有法紀觀念，以路邊拾得之物為例，民眾不知交由警方處置，甚至據為己有，不但於法不合，也與儒家「路不拾遺」的精神相距甚遠。這除了是認為臺民守法精神不足而須要殖民者的再教育外，同時，也是對於臺灣

⁶² 黃美娥以日治時期臺日文人詩歌酬唱為例，由臺灣文人對日本漢詩的引介、或是灌注於「詩話」的方式，除是詩歌知識論的建構外，亦藉由詩話的書寫隱寓政治目的。而日本文人引用儒教中詩大序進行實學性目的的做法，也發揮中國傳統詩歌中的「風雅」精神，成就了漢詩教化論。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頁15-20。

⁶³ 小野西洲：〈勸告為父兄者〉，《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27日-28日。

民眾道德感不足的憂心。所以，要改變臺灣民眾，與其以嚴厲法條做事後懲罰，倒不如先透過儒家綱常來培養未成年少年的法治觀：

嘗聞刑期無刑，又聞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此二說無非望人改過，並望父兄教督其子弟焉。……夫少年之所以昧良者，多由於家庭教育之不善。⁶⁴

改正社會風氣並減少青少年犯罪率的第一步，小野西洲認為不是刑罰而是儒家綱常，也就是要將臺灣習以為常的家庭風俗回歸儒學思想的本質，才是改造臺人本性的第一步，：

本島人之少年，與一般之本島人多有拾取遺物痼癖，如子弟外出，於他處拾得遺物歸示諸父母，其父母不特不見責，反褒獎其子弟之能且引以為幸福者。⁶⁵

小野西洲對臺灣傳統社會風氣的剖析，含有己身對傳統倫理觀的遵循，這種「先倫理後法律」的看法，貫徹儒學從古到今的觀點，蔡仁厚說：

倫理的功能，主要是靠自覺的實踐。在制裁力的運用方面，儒家除了講「禮」，同時也肯定「法」。不過，儒家認為「禮為主，法為從」。禮，防患於未然之先，盡的是積極引導的責任；法，制裁於已然之後，用的是消極的賞罰手段。禮屬於教化，是倫理的範圍；法屬於政治，但也同時和倫理相關聯。如果說，倫理的效用力所不足，而這個不足，就必須靠法律來補救。以往如此，現在和未來，恐怕還是一樣。⁶⁶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小野西洲：〈勸告為父兄者〉。

⁶⁶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65。

蔡仁厚對於儒家倫理觀的肯定，說明儒學思想的普遍精神，以及日常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行為秩序。當儒學由中國傳播東亞各地後，所衍生出的儒學觀點或有差異，但這種「防範於未然」的道理是超越時空及地域限制。身為執法人員的小野西洲，也體現了這個「先禮後法」的精神。所以在〈論權利與道德〉中他感慨臺灣人因小利而倫理淪喪、致使社會風氣敗壞澆薄：

獨不解本島人，鯁鯁然曰權利矣、曰義務矣，道德遺棄、情誼不顧，幾自以為道。即令些少金錢，細微物件，亦必有非主張的自己權利，不肯干休。朋友之交興頌、兄弟之親紛爭、僕告其主、徒訴其師，甚至父子之間，結怨不相識，父控其子者有之，子控其父者有之。嗚呼！權利思想之發達，一至於斯，所謂國民倫理安在哉？⁶⁷

社會風氣是否能良善，倫理秩序的維持是首要目標，其中，透過五倫中「父子」、「兄弟」的親屬運作來達到防治犯罪的目的，⁶⁸是最事半功倍的手段，這與小野西洲本人兼具法務人員身份以及發揮其儒學修養的風格是一致的。

基於對殖民地臺灣社會風氣的檢討，小野西洲倡導經世的文學觀與其政治理念相互結合，首先，他以中國文學為例，認為文學與道德不可分：

余謂支那文學於道德究不能出其範圍焉，自堯舜以來，支那國民之意嚮，以修齊為始基、以治平為終極；尊崇孔孟之四億萬黎庶，咸以道德為根本。政治文學家胥倚賴之，以先王經世之志為志，欲徵諸實用而不能竟罹不測之禍，因假吟詠以訴厥苦衷；以孔孟仁義之教為教，欲實踐躬行而不得，反遭變故之來，乃托歌辭以抒其憂思，為達為躬，均迫於事之無可如何。則謂支那文學，一在政治的逆境、一在道德的逆境。⁶⁹

⁶⁷ 小野西洲：〈論權利與道德〉，《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10日。

⁶⁸ 在論詩時也不忘強調詩有正人倫的功用：「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不外乎詩。先王正夫婦、宗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亦以之。」同註17。

⁶⁹ 小野西洲：〈支那文學論〉，《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2年11月6日。

小野西洲闡述中國文學傳統以來知識份子「以天下爲己任」的特點，也強調文學與政治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那麼日本呢？道德倫理與日本的國民生會有什麼樣的聯結呢？論及日本的國民性時，他也將重倫理的美德視爲日本民族的優點：

凡人各有特性，或適於文、或適於武、或商或工，各有適業，國民亦然。德人以學術鳴、法人以美術顯：美以商著、英以工雄。蓋國民特性之善良，則國家因而榮盛，否則衰亡。夫歐美各國，所以能致榮盛者，以其善良之特性。……然則我日本國民之特性何如？試先就國體而論，我國皇室，萬世一系，其與國民，宛如父子關繫尤切……。西洋人中或有愛國而不忠君；或有忠君而不愛國。皇室之與人民，義則君臣，情如父子。⁷⁰

文學家秉性不同、文章風格各異，這是前述小野西洲在論文時的體認。將此互異性擴大，他更進一步指出世界各國國體的不同，所以國有善惡、有強弱、有發展特質，因此呈現榮盛或衰亡的不一情況。日本則因爲有儒家五倫觀做爲基礎，並與日本萬世一系的道統相結合，所以親屬關係中的「父子」被擴及成「君臣」間的「忠孝」關係，此乃日本國體的精髓，故曰：「夫日本皇帝，則爲國民之父，故國民盡力于君，可謂忠而孝，忠孝一致，此則日本之國體也。」⁷¹這不但是小野西洲心中日本異於其他世界各國之處，也代表日本殖民者對其國體觀的普遍認知。⁷²

⁷⁰ 小野西洲：〈論日本國體與國民性〉，《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24年3月17日。

⁷¹ 同前註。

⁷² 例如張崑將即指出中國是「忠孝二元」論，而非日本的「忠孝一本」論：「中國士大夫常言：『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或者如《孝經》所說：『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種思維是論『忠』前提必須照顧到『孝』所以是『忠』、『孝』二元性結構，而非一元性，理由無他，因為二者皆就現象具體的道德意義而言，故『孝』一般在中國士大夫觀念中，是『至德』也是『要道』，是現象倫理中最根本的道德，『孝』往往優先『忠』而被考量，因而『忠孝』不可能一體。但如果論忠孝時，把『忠』、『孝』看成超越現象經驗的道德原理，並且結合宗教崇拜時，則『忠孝一體』乃成爲可能。」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爲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6月），頁257。

那麼，小野西洲要如何培養殖民地臺人對日本國體的認同，甚至轉而由「中國魂」變成「大和魂」呢？尊崇儒家的小野西洲藉由對中國典籍的重新詮釋，企圖在中、日國民性的比較下，引導臺灣人脫離中國國民性，而以日本國民性為參照，建立起能與日本一脈相承的新國民性。小野西洲認為，中日兩國雖然都談「忠君愛國」，但意義卻是南轅北轍，此點可由《戰國策》和《孝經》中的說法作為佐證：

《戰國策》云：「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⁷³忠君愛親者，即「忠孝」之意。「愛親」二字意義鄭重矣。讀《孝經》，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教也。」⁷⁴

民眾懂得孝順父母，自然能以同理心將此孝心推及到別人的父母，而不敢有厭惡輕慢之心，此即「孝」的表現。所以君王若能盡孝，則可做為全民表率、進而擴展到全天下，因為「孝」為普遍性的美德，無論高低貴賤皆可實踐的良善行為。但「敬親」如此，「愛國」在中國的「君」與「民」間卻有差別：

又讀《戰國策》，有謂「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云云，⁷⁵從可知愛國者，君主應奉戴之語；愛親者，國民當服膺之語。若支那人言愛國者，謂其七國之君主愛自國耳。若支那天下統一超越列國，嘗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但言天下，不言列國，國民似無用愛國心。支那狀態不一，有時列國分立、有時天下統一。然伊古以來，支

⁷³ 原文應為陳軫對楚王言：「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小野西洲的引文雖跟原文略有不同，但無損他在此對中日兩個文化差異的比較。〔漢〕劉向輯，《戰國策·秦一》（臺北：里仁書局影印本，1990年），頁127。

⁷⁴ 語出《孝經·天子章第二》，李學勤：《孝經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6月），頁6。

⁷⁵ 《戰國策·卷三十三·中山》，頁1191。

那天下統一之時多，列國分立之時少。以故國民上下，均無有愛國之心焉。
我日本則不然，日本與支那對峙，常畏其大國，事事物物，務求不至相形
見絀，是以我國民不能無愛國心。⁷⁶

小野西洲以戰國時期的歷史為例，認為中國民眾雖知「敬親」為孝，但卻因為天下分立、統一不定而造成國民愛國意識薄弱、缺乏國家觀念，造成愛國者往往只有國君而已。但日本則不然，在領土小於中國、文化多自中國輸入的歷史背景下，日本國民反而因此凝聚共同意識、進而成就愛國心；更因此能共同營造幕末時「尊王攘夷」的氛圍、實踐忠君愛國的真誠目的。⁷⁷這些分析都在告訴曾經身為中國人的臺灣民眾中國國民和日本國民的差異。小野西洲試著灌輸臺灣人必須要重新檢討過去身為中國國民的認同，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重新具備新國民意識。這個「新國民」和過去的國民不同點就在於愛國心的有無、忠誠度的強烈與否，甚至自豪於身為日本國民，可以做到「移孝作忠」、進而達到「忠孝一致」的理想：

非云孝道可不重，孝者愛其親，家庭事也。家庭事，不必與國事並舉，況移孝作忠，孝者所以事君，《大學》嘗言之。⁷⁸我國自與列國交通，交通有時或有戰事，有戰事，民以全力求保其國，國保斯君可紓，國祚可久，是即我國民所由以忠君愛國為國民的常談也。⁷⁹

如此，方能符合小野西洲所認可的國體精神，為殖民地臺灣豎立一個完美的愛國理論，這個理想，說明小野西洲為何努力地想要將其對祖國的忠誠灌注於字裡行間，即是希望臺人能藉由這些教化性強烈文章的閱讀，開啓臺人對日本精神的了解與崇拜，才能使臺人由原本的支那國民轉變成日本國民、逐步實踐殖民統治的

⁷⁶ 小野西洲：〈論日本國體與國民性〉。

⁷⁷ 小野西洲：〈愛國愛民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12月22日。

⁷⁸ 原文出自《大學》，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頁12。

⁷⁹ 小野西洲：〈愛國愛民論〉。

理想。⁸⁰

小野西洲既具儒學修養，又有經世理念，他藉由對中國傳統典籍的闡釋，從中列舉和自己國體論述有關的文句作為佐證，增加文章對閱讀者的說服力，尤其當主要閱讀者為受過中國儒家教育的臺灣知識份子時，亦可藉由這些求學過程中所共同閱讀過的聖賢書籍，開啓他們超越中國國族認同的思考。由此可見，儒學對於小野西洲的影響，不限於在文學觀點、創作態度或是政治理想的範疇⁸¹，更可擴及到國族精神史的層次加以闡述。不過，上述文章固然代表小野西洲對於殖民地統治的憧憬和理想，如何與其經世理念加以結合，確實告知臺灣人要如何努力提升修養與文化，才能符合小野西洲一貫的求實態度、並達成改造殖民地臺灣的願望？小野西洲認為要改變臺人，由外要從政治積弊著手；由內，則要勸勉臺灣人從基礎「修身」做起。首先，小野西洲評論臺灣的落後原因，主要是「實政不興」，他以他的好友、時任宜蘭廳長的小松吉久為例，⁸²指出小松吉久在治理宜蘭時，事先參考過清領時期藍鼎元在《鹿洲全集》中為治理臺灣而擬定的實業計畫，可惜藍鼎元雖有心在臺力行實業計畫，卻因清廷政治敗壞而功虧一簣。⁸³故小野西洲總結認為，中國實業能力極為雄厚、物產又富，卻未能實踐孟子的政治理想，他說：「孟子論王政，基於社會經濟策，社會經濟策，在乎救蒼生之貧弱。」⁸⁴由是之故，他特別推崇《孟子》裡的一段話：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

⁸⁰ 劉岳兵認為，此種以儒教學說宣揚日本國體的意圖，助長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就這樣儒學這種具有親和力的文化形態被肆意地利用成為軍國主義者鼓吹、美化野蠻的侵略戰爭的工具和實現『國際親善』的重要手段。」所以小野西洲的思想，實已開啟日本軍國主義在臺灣的先河。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6月），頁116。

⁸¹ 小野西洲：〈實心以行實政〉，《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7年11月20日。

⁸² 小野西洲與小松吉久往來相善，可參考〈訪小松宜蘭廳長〉，《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7年11月19日。文中對兩人交情及小松吉久的治績多有描述。

⁸³ 小野西洲：〈實心以行實政〉。

⁸⁴ 同前註。

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³⁵

小野西洲對於儒家思想下的治世理念悠然神往，但，為何當下中國並未因此強大富庶而達成此一理想境界呢？他認為：

孟子距今二千餘年以前之人也，顧其所言適合今之支那，是豈支那王政獨備於古昔、衰於今日乎？抑支那政治，億萬斯年，一以貫之，未曾有更改者乎？信哉孟子是言！奈刻下支那積弊、迴殊往古，大抵如此。如我臺灣昔在清朝治下，其政治積弊，或有類于斯乎！³⁶

雖是以中日戰爭後勝利者的姿態來到臺灣任官，小野西洲在文章中對當下中國的時政批評仍算公允。他見到中國的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因此具備「以實心行實政」的有利條件，可惜卻因為政治敗壞，而無法有效地將這些先天條件完全發揮，這是小野西洲及其同時代文人在嚐到勝利果實後最深切的感觸，所以用中國之例來警惕日本，有提醒日本當戒慎恐懼的意味。但論及臺灣如何治理的問題時，除點出癥結在於受到中國統治的連累外，亦帶有以日本經驗全面改造臺灣的野心。³⁷

引經據典以儒家觀點論政，是否代表小野西洲一味地追求復古政治，而忘記時代的變動與進步？實際上並非如此。在具有經世抱負的理念下，小野西洲致力進行的是儒家思想在面臨現代性社會時的新詮釋和新功用，如此既能顧及他對於儒學的尊崇，又能夠有足夠的證據用來支持其言論、以達成於殖民地宣揚日本國體和國策的目的，畢竟儒學就如同漢文般，是與中、日、臺等東亞諸地域息息相關的文化原素，以儒家學說作為論述依據，對於同受儒學思想影響的臺灣知識份

³⁵ 原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頁282。

³⁶ 小野西洲：〈實心以行實政〉。

³⁷ 小野西洲：〈臺灣治績頌〉，《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7年4月5-7日。

子而言較具說服力。所以他在〈島民幸福〉中引用子產、孔子論政之語，歌頌日本法官在臺灣執法後讓臺人得以安定生活、⁸⁸〈君德如天〉歌頌日本臣民尊守憲法的精神外，亦引《孟子》：「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之語，⁸⁹頌揚日本天皇：「我陛下可謂與民同樂、與民同憂」的偉大精神。⁹⁰更以《易經·雜卦傳》說明不可抗拒時代進步與文明到來：

雜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⁹¹乾坤其易之門，觀目下世界，若隱寓一易道……。新舊時代之紀年、送舊迎年，普通之例；年改物新，亦尋常事。物新之顯著，則曰鼎新。五年戰役，故有史以來一絕大戰役也，此後鼎新，必將見的有史以來絕大鼎新，非突發於今年明年之內，或釀成于幾年幾十年而後發現。此中徵兆，世人莫知變革之來，且文明之潮流，時焉順行、時焉逆行，順逆遞遷而寸退尺進。⁹²

小野西洲認為世界大戰的發生是無可避免之事，問題只在於國際壓力累積的多少、發生時間的快慢而已。但，世界大戰固然給不少國家帶來破壞，卻也由德國恃強欺弱終遭慘敗、國際聯盟的成立等為世界變革帶來契機，所以鼎新變革是常態，對中國、對世界皆有利：

可又如支那大陸，西太后時代與現時國民思想，確有進步。倘云兵力毋庸逞強、國內得整秩序，必有所貢獻于世界文明。支那已然，他國可推測而知焉、世界之進步如斯。

⁸⁸ 小野西洲〈島民幸福〉，《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16日。

⁸⁹ 原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頁299。

⁹⁰ 小野西洲：〈君德如天〉，《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2月24日。

⁹¹ 原文出自《易經·雜卦傳》，郭建勳注譯、黃俊郎編：《新譯易經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2月），頁598。此意為消除舊物、創立新物。

⁹² 小野西洲：〈世界鼎新〉，《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9年3月23日。

是變則通，通則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⁹³將見於大戰後之鼎新之世界乎？彰往察來，顯微闡幽……，吾人不禁為世界幸、為世界人民幸。⁹⁴

從《易經》新舊交替的觀點出發，小野西洲看到文明進步不可擋的重要性，日本因為師法西方、維新成功而有文明，才能成就優秀民族，所以日本文明和國體，可做為殖民地臺灣的表率：

獨我日本帝國之民族，素質卓絕優秀、世界無倫。我國體之純美、歷史之輝煌，頗有明徵。特明治以來，國運勃興之狀，令世人驚惶嘆息。凡我能咀嚼東西兩洋之文明，造出日本獨得之文明，舉為農為工為商，發揮能力，又為兵而明示威力，無忝為世界無匹之良民族。⁹⁵

而要維持日本的優勢，就要持續增加人口和土地，才能持續擴大國力，避免成為弱肉強食下的犧牲品。小野西洲引《大學》之語，提醒執政者重視國家的人口和土地，才能立穩日本東亞霸主的地位。⁹⁶他藉此透過臺灣報紙告知臺灣人，若臺灣人民能變成日本新國民、土地變成日本領土，對臺灣或日本皆有利而無害。

小野西洲由儒家經典的闡釋出發，將聖賢學說靈活運用到對當下國際局勢的剖析，並綜合論述日本國政以及殖民地臺灣的治理，在在都顯示他的儒學修養和經世理念的結合，並引導至在他對實業的重視。所以小野西洲在論日本與中國的交流管道時，認為兩國交流不但可透過文學，亦可藉由日本在中國投資的實業促進雙方的親善，他先引《易經·雜卦傳》之語論證日支來往乃是天經地義之事：

⁹³ 原文出自《易經·繫辭上傳·第十二章》，頁524。意為時間久了，自然會獲得來自上天的祐助，吉祥而無所不利。

⁹⁴ 小野西洲：〈世界鼎新〉。

⁹⁵ 小野西洲：〈論國運興隆及民族繁盛〉，《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7月13日。

⁹⁶ 他說：「《大學》曰：『有人此有土。』伍子胥曰：『十年生聚。』是知國運之興隆，與民族之繁榮，有互相關係焉。」〈論國運興隆及民族繁盛〉，《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

雜卦傳云：「同人親也」，親之云者親其所同情之謂。是卦初九之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⁹⁷誰咎云者，又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之謂。吾人於日支兩國紳士往來，深望其有合於同人之謂焉。⁹⁸

引《易經》為證，是欲用儒家典籍說服同樣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和臺灣，認為中日兩國不應站在對立面互相仇視，而應以同人之親的態度來往，才不會遭致禍患，故日本在中國的實業投資，實是增進兩國情感的良藥，中國不應該排斥：

我日本實業家中，於兩大戰役前，著眼支那，著手事業者不少。大戰役後，遽爾增加，至以開發支那富源，為我輩實業，最大要件。初三井物產會社，獨佔權利，厥後與之雁行者，踴躍繼出，或有希望凌駕三井者，如斯關係。雖云微弱，然較諸詩文交際之昔日，可謂廣大的進步。⁹⁹

依此「往來」的標準來看，舉凡思想、文學、實業等皆是日本與中國得以「親善」的方法，小野西洲欲以日本霸權控制中國的企圖彰顯無遺。日支交流如此，更何況是殖民地臺灣？例如他引經據典，期能灌輸臺灣人應有與日本國內般重視紀元節的思維，以建構日本在臺統治的合法性：

吾人每逢此國家發展之紀念日，不可不思更新之義。更新之義為何？即《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矣。又日新者，朱子云：「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者也。」……人人勉強自己事業，著著焉上期國家之興隆，如此者可謂曉悟紀元節之意義，則庶乎忠君、愛國、修己，一切行為，無

⁹⁷ 「同人親也」出於《易經·雜卦傳》，意思為與人當和同而親近。初九〈象傳〉則為出門而和同身邊的人，誰又會有禍害呢？小野西洲此語既有動之以情的期許，卻又隱含威嚇之語，認為中國本應該與日本親善，若不與鄰近國家親善則必遭禍害，即日方會以武力攻打中方。原文出自《易經·雜卦傳》，頁598。《周易·上經·同人卦第十三》，頁114。

⁹⁸ 小野西洲：〈日支士紳互相往來〉，《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12月7日。

⁹⁹ 同前註。

非藉此紀元節，有以感觸其天良也夫。¹⁰⁰

就這樣，小野西洲透過對儒學思想的包裝，進而在日、中、臺三者間實踐其政治目的。如果當日本知識份子可以藉由儒家的重新詮釋而找到一個在新舊交替時的依循之道，同樣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甚深的日治臺灣知識份子，也將在殖民者的鼓吹和誘導下，重新對儒家思想有新的體會。日治臺灣人是要選擇維護中國儒家的傳統，還是甘願掉入殖民者的儒學詮釋中無法自拔？亦或是可以在兩者的衝擊下建構出最適合日治臺灣的儒學觀？¹⁰¹無論是何者，除證明日治臺灣文化的多元與複雜外，這也將會是臺灣在日本近半世紀統治中所面臨到的挑戰。

五、結論

本文以日本來臺文人小野西洲為例，論述其儒學修養外，亦由文章剖析其經世理念，以探究日本來臺官員建設殖民地臺灣的想像。小野西洲身份多元，他是文學創作者、法務人士、公務人員和語言學者，所以他關心的議題也十分廣泛，但根本都是以自身儒學修養為撰文依據和行事準則。透過對小野西洲文章的闡述，可發現他對於儒家先哲的景仰、儒家經典的解讀，以及將傳統典籍的觀點引用於實業理想和政治理論。這些帶有經世色彩的文章，不但是小野西洲積極且熱忱的表述，也反映出他對殖民地臺灣的統治期待。但在尊崇儒家思想與提倡倫理道德的背後，小野西洲並未忽視文明進步的到來。他將傳統經典做出與新時代相應的詮釋，最後發揮他的經世理念，使得吾人能透過此一個案研究，勾勒出日治臺灣儒學的部份風貌。綜合上述，本文以探索小野西洲或其同時期日本來臺文人的求學經歷與儒學修養為重點外，未來將此以為例聯結臺、中、日三方的思想淵源，

¹⁰⁰ 小野西洲：〈紀元節意義〉，《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8年2月11日。

¹⁰¹ 身為被殖民者的臺灣人，如何在儒學之間掙扎與選擇，可參考林以衡：〈尊孔與識孔——日治台灣孔子形象的神聖性與世俗化〉《政大台灣文學學報》第29期（2016年12月），頁147-174。

並深入探究這些寓臺日本文人知識生成的背景，梳理臺灣、日本與中國三地如何透過儒學產生文化、政治聯結。如能逐步對上述研究做出結論，相信以日治臺灣為出發點的東亞研究，將更為完備。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劉向輯，《戰國策·秦一》（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清·石玉昆，《忠烈俠義傳》（即《七俠五義》）（臺北：天一出版社，1993年）。

李學勤，《孝經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郭建勳注譯、黃俊郎編，《新譯易經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臺灣日日新報》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語苑》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二、近人論著

1. 專著

臼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6月），頁291。

辻木雅史著、田世民、張崑將譯：《日本德川時代的教育思想與媒體》（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6月）。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3月），頁419。

徐志平、黃錦珠：《文學概論》（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9月），頁27-28。

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6月），頁257。

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混生》（臺北：群學出版社，2013年8月），頁243。

朝日新聞社編：《日本歷史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年6月），頁291。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梅家玲編：《文化啓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8月），頁298-299。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0年6月），頁110-111。

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6月），頁116。

劉廣京：《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5月），頁162-164。

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3月），頁65。

2. 期刊論文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頁27-38。

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第9期（2010年6月），頁97-122。

林以衡：〈尊孔與譏孔——日治台灣孔子形象的神聖性與世俗化〉，《政大台灣文學學報》第29期（2016年12月），頁147-174。

翁聖峰：〈一九三〇年台灣儒學、墨學論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第19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21。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15-20。

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翻譯論叢》第7卷第1期（2014年3月），頁37-80。

3. 學位論文

李尚霖：《漢字、台灣語、そして台湾話文：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台湾語文運動に対する再考察》（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研究博士論文，2006年）。

4. 報章

大國錦成作、小野西洲轉引：〈梧窓漫筆〉，《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6年2月23日-1927年3月27日）。

小野西洲：〈支那文學論〉，《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2年11月9日）。

小野西洲：〈文弱流弊論〉，《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2年2月27日）。

小野西洲：〈論文章功用〉，《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2年2月4日）。

小野西洲：〈論善惡〉、〈論善惡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3年5月28日-29日）。

小野西洲：〈孝道〉，《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4年1月20日）。

小野西洲：〈病中漫言〉，《臺灣日日新報》，第2版（1915年10月31日-11月20日）。

小野西洲：〈詩想〉（一、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6年2月17日）。

小野西洲：〈愛國愛民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12月22日）。

小野西洲：〈日支士紳互相往來〉，《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12月7日）。

小野西洲：〈世界大戰如何結局〉，《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7年11月23日-12月3日）。

小野西洲：〈時事評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7年5月30日-6月4日）。

小野西洲：〈訪小松宜蘭廳長〉，《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7年11月19日）。

小野西洲：〈實心以行實政〉，《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7年11月20日）。

小野西洲：〈臺灣治績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7年4月5日-7日）。

小野西洲：〈君德如天〉，《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2月24日）。

小野西洲：〈紀元節意義〉，《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18年2月11日）。

- 小野西洲：〈島民幸福〉，《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16日）。
- 小野西洲：〈勤勉論〉，《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8年11月12日）。
- 小野西洲：〈論成敗〉，《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8月22日）。
- 小野西洲：〈論國運興隆及民族繁盛〉，《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7月13日）。
- 小野西洲：〈論權利與道德〉，《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10日）。
- 小野西洲：〈醉後漫錄〉，《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1月19日）。
- 小野西洲：〈戰亂大觀〉，《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18年3月22日-4月3日）。
- 小野西洲：〈勸告爲父兄者〉，《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8年4月27日）。
- 小野西洲：〈世界鼎新〉，《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19年3月23日）。
- 小野西洲：〈論文〉（一、二），《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9年4月6日）。
- 小野西洲：〈論日本國體與國民性〉，《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1924年3月17日）。
- 小野西洲：〈別府溫泉〉，《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27年8月25日-27日）。
- 小野西洲：〈論墨子〉，《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1930年8月27日-9月2日）。
- 小野西洲：〈內地遍路記〉，《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1932年10月2日-5日）。
- 小野西洲：〈至誠！醇化の力〉，《語苑》第28卷第7期，頁62-84。
- 小野西洲：〈漢文講義〉《語苑》第7卷第8期，頁36-40，頁56-58。
- 草庵（小野西洲筆名）：〈金手環〉，《語苑》第9卷第11期，頁51-62。
- 草庵：〈土語小說：恋の羅福星〉，《語苑》第7卷第3期，頁36-56。
- 蒼海：〈首物語〉，《語苑》第8卷第12期，頁38-58。
- 樗牛君作、小野西洲轉引：〈文學及人生〉，《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14年4月22日-23日）。

Japan scholar Ono Shinze's training-cultivation and Statecraft Deal: The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Taiwan

Lin, Yi-He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astern Asia studies, the academic studies on Taiwan, whatever in history,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One of the themes worthy of attention is the context of thoughts. The reason is that Taiwan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onfronted with serious challenges from political transition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ly changes.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many officials from Japan brought forth colonization by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mixed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and Japanese spirit. In this circumstance, conf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occurred and beca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culture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his study, I research on one Japanese official Ono Shinzei. His thoughts oriented from Confucius, but expanded the part of utilitarian in order to reinforce colonization in Taiwan. Through this method, he tried to persuade Taiwanese people of the new citizenship to reach Japanese political purpose.

Keywords: Eastern Asia, Confucius, Ono Shinzei, Statecraft. colonial